



| 人间丛书 |

失语者的呼声

中国打工妹口述

本书记录了 16 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

当打工妹满怀憧憬地来到城市以后，她们常常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超时加班，职业病和工伤的威胁，拖欠工资和人身侮辱，还要面对城市的冷漠与歧视。然而，她们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抗争，往往也难以取得全面胜利。

可她们为什么还不断地涌向城市？为什么进城了，又回乡，回乡了，又进城？进城务工仅仅是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或者是开开眼界？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城市的繁荣离不开打工妹辛勤的汗水，因此，就不该让她们再付出辛酸的眼泪！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失语者的呼声

中国打工妹口述



Copyright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 / 潘毅，黎婉薇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

ISBN 7-108-02390-3

I. 失… II. ①潘… ②黎… III. 纪实文学—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970 号

策划编辑 黄 华

责任编辑 黄大刚

装帧设计 朱 铨

设计制作 贾 鑫 [北京阳光谷文化]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张14.5

字 数 80千字 图 片 65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3.00元

目录

序 006

导言·小历史的火光 008

导言·在精彩和无奈之间开辟自己的空间 020

027 壹·离乡背井

1. 脱离家庭才能得以“逍遥” 030
2. 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 043
3. 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 052
4. 两手空空想回家 068

077 贰·寻找婚姻自主的空间

1. 只为逃脱自我封闭的世界 080
2. 打工邂逅爱情 087
3. 为了找个避风港 097
4. 50岁女人的自主 107

117 叁·打工路上的苦涩

1. 都是胶水惹的祸 120
2. 彷徨于打工路上 131
3. 机器轧掉了我的手指 143
4. 我的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155

165 肆·争取中成长的女工

1. 深圳只是我一个驿站 168
2. 给工人装上一部电话机 181
3. 抗议中成长的秋月 191
4. 站在反抗线上的女工 208

“人间丛书”出版缘起 226

乐施会 228

“女工关怀”简介 230

序

庄陈有

乐施会总干事

香港乐施会于1976年由香港的志愿人士发起成立，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独立发展援助机构。1995年，香港乐施会与其他8家乐施会一起组织成立了国际乐施会，现在成员会已增至12个，服务遍及120个发展中国家。而香港乐施会则专注在中国、东南亚、东帝汶、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以及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人道救援行动及发展项目。我们的宗旨是与全社会携手、共同努力、改变贫困、弱势人群的生活状况。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乐施会确定了5个全球发展目标，争取尽快落实贫困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这5个目标是：有权得到可持续的生活保障、接受基本服务、生命安全受保障、被聆听和受平等对待（包括社会性别平等和多元化）。

从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社区组织发展、农村综合发展、增加收入、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政策研究和基本教育等。1992年，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建立之后，先后在昆明、北京、贵州和兰州设立了办事处，参与了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江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的紧急救灾工作。到目前为止，乐施会在中国18个省市，总共投入超过两亿港币的资金用以支持国内的发展建设。

近年随着城市化及城市发展，愈来愈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到城市寻找工作，由此民工权利保障问题也逐渐彰显。而乐施会也关注到民工所遇的种种困难，包括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工伤事故频发、家人不能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及保障等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平等的意愿，其中部分条文达到甚至是超越国际劳动法的标准。在《劳动法》实施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乐施会及合作伙伴对法律的推广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在法律框架内，探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模式和方法，在维权教育、法律援助及职业健康等方面做工作。在2003年，乐施会

开展了35个项目，投入超过六百万人民币，而2004年截至11月为止的25个项目，便已超过五百万人民币。另外，乐施会希望能与专家们研究和改善劳动法落实的效果，也同时增强工人文化素质，让他们能肯定自我价值，维护合法权益。

在法律实施的这个时期内，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外资量增加，我们当然欢迎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及发展，为我国带来更多资金及就业机会，可是跨国公司同时掌握操控市场的能力，迫使成本压低，导致劳工被剥削，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在不平衡的市场环境中变成压抑劳工的工具。在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下岗，而民办企业的出现，导致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劳工问题，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呈现了劳工弱势、资本强势这个新景况；同时资本的国际化，使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其中所导致的问题，都关系到国内劳动者的自身生活和社会平等，比如，如何解决非正规机构就业者参加社保问题，以及《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监督预防困境等。乐施会希望跨国企业能够确立保护劳工的标准，对劳工问题肩负更大的责任，可是，他们的反应却叫人失望。全球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大量机遇，但当所有人都在注意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和保持社会公义。

乐施会在中国发展援助项目的经验，就是通过加强与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组织、贫困及弱势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社会共同协作的前提下，完成扶贫和维权的目標，共同解决打工者、下岗工人、非正规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残疾人士所面对的问题。至于此等工作能否成功，则取决于我们在集思广益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能不能确保她们的声音被聆听。《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一书，是“女工关怀”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以最直接和全面的方式，记录了基层打工女性的声音，使她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实践表达意见的权利。

小历史的火光

潘毅

1993年的11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7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外五十多人被严重烧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农民工们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火，闪现着社会创伤，也映照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现有社会、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的三重社会压力，这三者一起创造出一种以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主体——中国打工妹。

这场大火已过去十多年了，中国打工妹的命运又如何？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境遇，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对接的过程中，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途。现代中国正在迅速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因此，我们曾经尝试在现代中国提出一种女工争取权益的次文体，它所承载的是女工们有声和无声的种种抗争，以及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妹生命之中的争取活动。

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者

的牺牲往往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小历史的趣味在于道尽大历史的虚妄，大部分人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起飞所引发的一些恶果（如贫富分化等）是必然甚至必需的，而本书所讲述的小历史将为这种论述画上休止符。

打工主体的生成

“打工”意味着将个体变成工作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工作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打工”一词意指劳动关系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意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成了两个在中国被非常广泛使用的词汇，与“工人”，即无产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更普遍使用的词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阶级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国家宣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劳动力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实现自我的新型主体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是为国家工作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老板”，不仅给工人发工资，同时还提供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总之，它是中国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老板”，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保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

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者则是劳动被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的蜕变体。

背井离乡的欲望

要明白打工主体的出现及其抗争的可能性，首先便必须探索打工主体欲望之所在。中国全球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打工潮从农村向城市的涌动，工业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面在既梦想成为城市工人，又梦想成为现代消费者的打工者中间将“现代化”神圣化。外出打工的欲望和经历错综复杂，想找寻一些线索弄明白打工者的生涯真是不容易。历史性和个体性相互冲突，相互胶着；我们的着眼处不在于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的因素，而在于个体在历史性中的种种挣扎和在种种困境中摸索出路。对于外出打工，我们的理解是源自一种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把中国农村的新生代一个又一个地送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书中，秋月把这种欲望说得浅白：“当时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衣服却好漂亮，而且皮肤也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追求生活的改善原本是劳动者普遍性的心愿，女孩子追求身份的转变也是人之常情，只是给“现代化”的大话语套上，国家与资本的欲望，便成为个人的欲望，相互扣连，相互胶着。

欠缺和欲望，为贫乏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所滋生的阶级经验相互映照，贫乏的农村恰恰是欲望滋生的温床。慧的父亲是国企煤矿工人，90年代末下岗，家庭经济拮据，父亲在家里种田无法养活一家人，再加上母亲患上脑血管等疾

病，医疗费用昂贵，一次化疗几百元，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无法承担的，一家4口的生活便陷入困境。农村医疗制度的保障不足，已经让无数家庭举债累累，惶恐度日。

没钱治病，父亲的性情变得暴烈，经常打骂慧和她妈妈；慧的妈妈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上，我早就去死了。”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之高，恐怕也不用在此多加注脚。15岁的慧，便渴望逃离家庭，她说：“跑得越远越好，外面的日子会很逍遥。”借了同乡的身份证，慧就头也不回地往城里打工去了。

华的命运与慧的有相似之处，父亲得胃病，家里没有钱动手术，将当初只有6岁的她许配给人；直至华17岁，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母亲才告诉她。华当时已有男朋友，家人极力反对，她只有痛苦地分手。华对父母的安排怀着很大的怨恨，对于男方的逼婚，她别无选择，便只好离家出走。

华说：“那时候我想出来散散心，不想面对所有的问题，想逃脱出来，找一个空间放松自己。”问她出来打工是否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空间，华这样回答：“其实我没有找到什么，心里很难受。为了那件事，我失去了快乐，活着和死了一样……”

历史所造成的伤痛无法补偿，结构性的裂痕进一步加深，20年的经济发展没有为打工妹的命运带来改变。农村的生活贫乏依旧，进城打工的欲望没有稀释。

中红是一位河南的农村姑娘，属90年代打工潮中的佼佼者，她年轻，不喜欢农村，初中毕业后在城里学计算机，18岁那年，她背上行囊，和其他老乡坐上劳动局的包车，直奔南方打工去。对于像中红一样的年轻人来说，打工为的是逃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城市打工生活

可是逃离农村，迎接她们的又是怎么样的城市打工生活？入城，受骗，是打工者的共同经历。阿芳第一天到达广州，在火车站旁，等待她的就是一群骗子。骗子当中有男有女，有的要带她乘车，有的硬要她买金链和戒指，有的要向她借钱。受骗的滋味不好受，阿芳咬紧牙关，独自找工去。多少打工姐妹像阿芳一样，她们出来闯世界，这个世界给予她们“最精彩”的序幕却是这些无奈。年轻的心灵受伤害，对人、对城市的不信任就这样产生，而且这种不信任深化着城乡的鸿沟。

相对阿红的经历，阿芳的受骗有点儿小儿科。阿红自幼失去双亲，大哥为她订下了一门亲事。为了逃避婚姻，阿红到镇里打工，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一年后，往宜昌打工的途中，阿红被老乡拐卖，以2400元的价格卖到了安徽的农村。就这样，阿红被迫与没有感情又大她十多岁的穷汉子结婚生子，苦闷的生活逼得她多次自杀，但都未遂。那时，阿红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回家，跟以前订婚的男子结婚。

出外打工，对许多打工妹来说，是想找寻一个避风港，但社会的无情，制度的压力，工厂生活的辛酸，又让她们跌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有希望时，背上行囊，往城里去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又发现老板太凶太无理，既不按时发工资，又经常骂人，打工者失去尊严，希望落空。回乡，很闷，无趣，无钱，又让她们蠢蠢欲动，再次往城里去。

芬的经历是典型的这种短暂而又重复的打工历程。她进了一间雨伞厂，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工资是计件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老板又拖欠工人工资，再加上食物不干

净，芬每天拉肚子，工作了二十多天，便撑不下去，于是便决定离厂回家。要求离开时，厂方不愿放人，不发“放行条”给她，保安又很严，芬只好尽量把衣物穿上身，然后在厂旁边的小杂物店把衣服脱下来，又回到厂宿舍里把衣服穿上带出来，就这样，她终于成功“逃出”工厂，连工钱也不要。

阿春说：“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才20岁的她，已经三进三出。第一次出来打工是1996年，进电子厂，负责剪灯脚，由于厂方没有发手套，手开始起泡发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便回家了。回家半年，阿春觉得无聊，又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于是第二次出来打工，进了一间生产VCD的电子厂，是焊锡位，她受不了焊锡线释放出的难闻气味，又跑出来。之后，她和一个朋友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受骗。她第三次打工是1998年3月，进了深圳一间印刷厂，每月700元工资。她的工作是将纸放入烘干机过胶，因工序中涉及化学品，如天拿水，所以她和和其他女工一样，经常出冷汗，经期也不准。阿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家乡。

就这样，打工者，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追逐一个又一个破灭的梦。“很累很累”是打工一族共同的语言，在工厂宿舍尖叫依然是女工的无奈的发泄。10年过去了，她们发出的声音仍如出一辙。慧说，尖叫也是一种解脱，好像心里面的什么东西都随着叫声一起飞出去了。

难道除了尖叫外，打工妹们别无出路？

伤的自白

慧的尖叫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力量，沉默的晓却让我们忐忑不安。对于她出来打工所受的伤害，她久久不能言说。

在珠海，晓进了一间有一千多人的塑料花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很差，由于做塑料材料要不时地烧熔塑料，再加工成不同类型的成品，因此车间里的温度很高。晓说：“经常会有危险，比如熔融的塑料落下来会把人烫伤，或者是在加工花叶时将手粘住；厂方没有安装空调，在高温作业环境下我们十分辛苦，但是这个车间的工资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多苦我们也要撑下去。”

可是，工作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晓进了那间工厂，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两名工人被机器轧伤手。

“我们车间里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她们的工作都是要用手把模具放进啤机（又名裁断机）内，有时工人没装好就按下按钮，手被轧到了；有时模具和机器也会失控，轧到工人的手。我刚去的一个月就有两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个女孩刚上班不久，手就残废了。后来，一个老乡做了二十多天就被轧到了小手指，只好拿着一个月的工资回家了。”

阿秀同晓的经历一样，进了一间生产电动马达的合资工厂。她原觉得这家工厂很不错，没想到这家工厂给她的一生带来了抹不去的阴影。

“我的工作负责装配马达的零件。厂里的管理并不严格，我做得很轻松，也很高兴。厂里的生活条件也不错，12个人一个宿舍，每个宿舍都有热水、冲凉房，每个人还有一个衣柜，厂方还给工人发被子、碗、筷等。”

阿秀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即将零件送入台钻钻孔，用手和脚踏着开动机器。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机器就已被西方国家淘汰，但阿秀却在操作着，她说：“马达里面的那个零件上面本来有一个小孔，只要在机器上钻大一点就行了，好像不是很危险。事先厂方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安全培

训，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操作。那天我把零件放进去，可是机器失灵了，砸到了我的手指。”

“我刚到那个岗位才两天就出了事，组长很害怕。那时我差一点昏倒，但我知道手指没有掉下来，一直在流血，整个手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坐车到了医院，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就听厂方的安排，截掉了手指。”

失去一节手指的阿秀很难过。“我想这下可完了，手都断了还有什么用，以前在家里父母邻居都很喜欢我，村里只有3个女孩子和我学历一样，找男孩子也可以挑别人；现在变成这样子，还说什么去挑人家，不知道能不能嫁出去。当时我很委屈，天天哭，好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和许许多多的工伤者一样，阿秀进厂打工几天就受伤，年近婚龄的她自此变得寡言、孤僻和自卑。

争取权益主体

打工妹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在中国，外资厂经常被比喻为桃花源，那里的少女们正在等待着男性们的追求。生产机器对普遍性的人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人，即女性才感兴趣。因为女性通常被想象为更加驯服、忍耐和适应工厂机器。

然而，作为一个打工主体，打工妹是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争取“行动者回归”而生成的一个主体。中国打工妹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打工者身体的资本规训权力，因此，打工者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

自己的生活。

尖叫和梦魇，并不是打工妹作为主体进行反抗的唯一策略。会尖叫的慧，同时也会参加工厂宿舍内的集体行动，她进入深圳宝安的一间电子厂不久，便遇上了怠工事件。慧忆述，当时那间工厂每月扣工人150元的伙食费，但伙食却很差，都是一些烂菜。“最便宜的菜才给我们吃，大饭堂里面菜很脏，像猪吃的一样，而且是青菜炒虫，菜里全部都是虫子。”慧由于不满意伙食，草拟了一封信，要求厂方改善伙食，并且在宿舍内发动其他打工者签名，结果反应不好。不少女工因担心被炒，所以那封信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女工的不满仍是存在的。

伟珍是一位来自河南的打工妹，比起慧，她有更多的集体争取经历。伟珍本来是一间电子厂里的装配工，在流水线工作。除了不停地超时加班工作外，还要受主管的责骂。伟珍回忆说：

“她(主管)以前也是与我们一个车间的，以前管一条生产线，后来她管整个车间的两条生产线。因为她的管理方法不对，以权压人，很刻薄，我们都不愿让她做主管，所以我们投诉她，想把她炒掉或调走。我们几个员工闯进生产办公室去讲理，但经理态度很恶劣，瞪着眼，讲话也很没水平，凶巴巴地说他是皇帝，我们没资格与他讲条件。我们说，我们打工的是来厂做事的，是有头有脑、有思想的，并不是天天被骂的。”但是，跟经理反映后没有任何回应，结果，伟珍想出了以怠工的方法来反抗那个主管。

“因为我们那条线是第一道工序，也就是插件，第二条线是执锡，第三条线是组装，若是我们有半天或一天不上班，工厂就不能生产了。我们这条线有几十个人，人也比较